



# 快 訊

## SSL Express

2015 年第 55 期 ( 总第 151 期 , 12 月 31 日 )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近日,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经济参考报》撰文,对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该文刊登在《经济参考报》2015年11月12日第A08版,这里全文刊发:

### 少子老龄化推动全面放开二孩

文/郑秉文

● 中国人均 GDP 离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还有较大距离,大约还需八、九年时间才能迈入高收入的门槛,但是,人口却过早地出现了明显的“高龄少子”趋势。

● 在经过 2013 年在全国范围开放“单独二胎”政策的“测试”之后,五中全会果断作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这是非常及时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面放开二孩,目的是为了“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个重要举措,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走向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 全面放开二孩之后,人们的生育意愿将决定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方向,计划生育政策的内涵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时俱进。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时使用了“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的表述。总书记使用的“高龄少子”准确地描述了我国当前人口结构的特征,成为全面放开二孩的主要依据。

---

## 什么是“高龄少子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10% 以上，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7% 以上。少子化是指“总和生育率”（TFR，指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的数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水平即低于“2.1”，如将其转化为 0-14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 18% 左右；或指“少儿赡养率”（0-14 岁人口占 15-64 岁人口的比例）偏低，如将总和生育率“2.1”转换为少儿赡养率，25% 可视为少子化的一个标志；还可用“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等其他指标来表示少子化。

从理论上讲，老龄化和少子化是两个不同概念，可以不同时发生在一个经济体之内。就老龄化而言，“长寿风险”（longevity risk）即人口寿命预期延长是其主要推手，就是说，在总和生育率既定的条件下，长寿风险将导致人口老龄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关系不大；就少子化而言，是指寿命预期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总和生育率和少儿赡养率等指标发生明显变化，出现严重的少子化，就意味着老龄人口占比逐渐提高，超过警戒线就会出现人口结构逆转的趋势，这也导致人口老龄化。

但是，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人口结构既出现了“长寿风险”，又出现了少子化现象，那么，其人口老龄化趋势将迅速滑向不可逆。在国际上，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国家，因此，少子化这个概念在日本十分流行，在很多报刊论文中，人们干脆将其合二为一，称日本为“高龄少子化”的国家。“少子化”和“高龄少子化”是日语里汉字的直接表达方式，因此，在中文里就直接借用过来。在英语里，少子化概念和术语的使用和普及远不如日语，且术语表达方式有很多种。但是，baby bust（少子化）与 baby boom（婴儿潮）形成对仗关系，应该是最为典型的表达形式。

### 高收入国家解决“少子化”的政策比较

在现实中，长寿风险往往与少子化连在一起，他们几乎是同时出现在高收入国家，或者说，越是高收入国家，越是伴随着长寿风险和少子化现象，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不考虑战争、饥荒和瘟疫等特殊情况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并不是水涨船高，而是相反。例如，1900 年美国总和生育率是 3.5，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到 1933 年下降到 2.3。战后在 50 年代出现了婴儿潮，总和生育率高达 3.7，但到 70 年代又下降到 2.0，2015 年再降到 1.89。换言之，越是高收入的国家，人们的生育意愿越是低下，综合生育率就越低，少子化现象就越是严重。相反，低收入国家几乎都是“多子化”的国家，换言之，越是低收入的国家，出生率越高。

2015 年联合国提供的人口数据显示（下同），世界平均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是 2.51，

---

而高收入国家只有 1.75，其中，英国是 1.92，法国 2.0，德国 1.39，荷兰 1.75，意大利 1.43，西班牙 1.32，加拿大 1.61，美国 1.89，日本 1.40，俄罗斯 1.66。比较起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则高达 5.10，南亚是 2.56，拉美是 2.15。世界平均水平的“少儿赡养率”是 39.7%，而高收入国家只有 26.0%，其中，英国和法国分别是 27.6%和 29.6%，德国是 19.6%，荷兰 25.3%，意大利 21.5%，西班牙 22.4%，加拿大 23.5%，美国 28.6%，日本是 21.1%，俄罗斯是 24.0%。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高达 79.8%，南亚 45.4%，拉美 38.6%。

上述总和生育率显示，所有高收入国家均为少子化国家，但其少儿赡养率却很好，大大好于综合生育率，高达 26%，英、法、美等国甚至已不属于少子化国家。这是因为，他们通过移民等政策的实施，极大地缓解了少子化的发展步伐，旨在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换言之，在移民国家，虽然综合生育率低，但其少儿赡养率却还算不错；但在某些非移民国家，比如日本，他们的综合生育率与少儿赡养率都很低，于是就出现了少有的“高龄少子化”现象。

### 中国人口“高龄少子化”趋势逼人

中国人均 GDP 离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还有较大距离，大约还需八、九年时间才能迈入高收入的门槛，但是，人口却过早地出现了明显的“高龄少子”趋势。

从老龄化的趋势来看，2001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就超过了 10%，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那一年正是中国人均 GDP 刚刚跨过 1000 美元的门槛，而人均 GDP1000 美元以下则属于“低收入”国家，还被称之为“贫困陷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典型的未富先老。1950 年时，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 7.5%，1980 年是 7.2%，30 年时间里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但是，在最近 25 年来，老龄化趋势急转直下：1990 年提高到 8.2%，2000 年是 9.9%，2010 年 12.4%，2015 年 15.2%。由此看来，计划生育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不能不说，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的投入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寿命提高十分明显：1980 年人均寿命是 65.2 岁，2015 年提高到 75.4 岁，35 年提高了 10 岁。而发达国家 2015 年人均寿命仅为 78.3 岁，就是说，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国，其人均寿命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从少子化现象来看，形势更为严峻。就总和生育率而言，2010 年中国仅为 1.53，而这一年中国则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人均 GDP 为 4200 美元以下)，相比之下，当年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则高达 3.08，“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DP

---

为 4200-13500 美元) 总和生育率是 1.82, “高收入” 国家 (人均 GDP 在 13500 美元以上) 的总和生育率是 1.76。换言之, 在刚刚走出 “下中等收入” 组的 2010 年, 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全球所有三个收入组的综合生育率, 即由于抚养成本等多重原因, 中国夫妇的生育意愿已经十分低下, 就连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

就 “少儿赡养率” 而言, 在中国刚刚走出 “下中等收入” 组的 2010 年, 这个数字是 23.4%, 而 “下中等收入” 组的平均值是 51.6%, 中国低一倍还多,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上中等收入” 组是 30.0%, 高收入组的是 25.9%。就是说, 中国的少儿赡养率与总和生育率的情况完全一样, 低于所有三组经济体 (“下中等收入”, “上中等收入” 和 “高收入”) 的平均水平。

上述总和生育率和少儿赡养率的曲线都经历了一个十分陡峭的下滑趋势: 总和生育率从 1965 年的 6.30, 下降到 1975 年的 3.01, 在下降到 1980 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一个孩子时的 2.52, 到 1990 年再次下降到 2.00, 到 2000 年下降到谷底 1.48, 由于单独二孩政策的原因, 到 2015 年回升到 1.55。少儿赡养率的下降曲线与总和生育率十分吻合: 高峰也是在 1965 年, 那年高达 74.6%, 接着就是逐年下降, 1975 年下降到 71.9%, 1980 年降到 61.0%, 1990 年是 43.8%, 2000 年 36.7%, 到 2015 年再次降到 23.5%。

老龄化与少子化的人口特征与发展趋势告诉人们, 虽然中国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 但是, 人口结构的逆转发展趋势是 “超高速” 的, 其原因有二: 一是人口受到长寿风险和少子化的双重夹击, 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受到一定威胁,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正成为典型的 “高龄少子化” 国家, 调整人口政策势在必行; 二是长寿风险十分严重, 但少子化趋势更为严重, 它是中国人口急剧老龄化主要推手, 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十分必要。

## 新常态下全面放开二孩非常及时

“十三五” 规划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新常态下, 及时准确地调整人口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从某个角度讲, 是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一个重要举措。在经过 2013 年在全国范围开放 “单独二胎” 政策的 “测试” 之后, 五中全会果断作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 这是非常及时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全面放开二孩, 目的是为了 “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 增加劳动力供给,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这个重要举措, 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走向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首先, 从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来讲, 全面放开二孩将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举措。在长

---

寿风险成为世界各国必须要普遍面对的社会风险之一的趋势下，除了移民，生育政策调整将是唯一可行的重要举措。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将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对社会公共支出将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明显增加，例如，养老金支出、老年护理与老年医学的支出规模、老年服务设施支出的投入规模等，都将持续提高，另一方面，中小学和儿童妇产医院等支出将不断减少，因此，在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社会公共支出上将存在着某种“置换”关系。

其次，就增加劳动力供给来讲，全面放开二胎是较长时期内一个治本的办法。其实，少子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早已初露端倪。在英文中有这样一句老话：“人口学就是经济学”（Demographics are economics）。2 个世纪前，马尔萨斯曾有一句名言：“增长的人口意味着增长的经济和增长的税收”。众所周知，少子化必然导致劳动供给下降，在土地、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必将减少劳动产出，必将影响经济增长。大家知道，早在 10 年前的 2005 年，沿海一带就开始出现“用工荒”，后来逐渐蔓延到内地，劳动价格随之逐年攀升，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早已不复存在，有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向东南亚转移，沿海制造业面临困局。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少子化催生了新常态的提前到来，东北三省经济大面积滑坡就是一个明证：其就业人口外流导致其经济增长乏力。对刚刚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新常态下的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是撬动经济增长、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和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杠杆。

最后，就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来讲，全面放开二胎是一个重要尝试。全面放开二胎，既是社会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也是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举措，对促进增长、提高保障、稳定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面放开二胎，符合社会长期发展的需要和人民长期福祉的要求，在新常态下，是计划生育政策顺势而为、与时俱进的重大调整，是主动顺应人口均衡发展和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这是因为，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历史阶段之后，财政收入必将减少，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支出能力必将受到明显约束，进而将有可能诱发产生其他不利的社会因素，甚至出现社会动荡，从很多国家的教训来看，这时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恶性循环之中。对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来说，与单独二胎政策一样，全面二胎政策也是一个尝试，如同 2013 年底，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开放“单独二胎”政策时，有关方面估计，在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 1100 万对夫妇中，第一年大约能有 200 万申请生育第二胎，但结果却大大低于预测值，提出申请的仅有 69 万对；截至 2015 年 8 月底，申请生育第二胎的夫妇为 169 万对，在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妇中仅占 15.4%。现在的生育主体是 80 后、90 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已明显发生变化，

---

养育孩子成本也明显增加，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之后，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在不断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因此，全面放开二孩之后人们的生育意愿将决定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方向，计划生育政策的内涵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时俱进。

### 经济增长：放开二孩 实行适当经济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全面放开二孩是对单独二孩政策连调的结果，本质上讲仍属于计划生育的范畴，正如五中全会指出的，“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在过去的 35 年里，“一孩政策”的实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对控制人口和缓解资源约束等功不可没，对当前人均 GDP 能够跨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做出重大贡献。展望未来，从“一孩政策”过渡到“二孩政策”具有现实的客观性，它无疑将迎来二孩婴儿潮的到来，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全面放开二孩只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增长能否真正实现，增长质量能否得到保证，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国际实践证明，没有制订和实施正确与适当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即使人口持续年轻化，人口红利始终伴随左右，但也未必能够实现增长，反而会出现回落、徘徊和下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阿根廷就是一个案例：1950-1990 年，其总和生育率从未低于 3.00，最高时达 3.44；1950-2010 年，其少儿赡养率从未低于 40.0%，最高时达 51.0%；虽然这两项指标很好，但是，阿根廷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未能实现进位，究其原因，是因为失败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另一方面，诸如香港、韩国、新加坡、卢森堡和瑞士等一些小中型经济体，他们的少子化趋势十分严重，其总和生育率依次只有 1.20、1.26、1.23、1.57 和 1.52，少儿赡养率分别只有 16.4%、19.2%、21.4%、23.6%和 22.0%，远不如阿根廷，但是，由于他们制订和实施了恰当的政策，不仅早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而且今天依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论坛历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大型经济体中，德国的总和生育率和少儿赡养率分别只有 1.39 和 19.6%，低于日本的 1.40 和 21.1%，但德国的经济增长始终领跑欧盟，即使在世界经济中也是佼佼者。（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链接：



■“十三五”专家解读

# 放开二胎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

□ 曹宇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中国人口政策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关系到人口结构的调整，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来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 什么是“高少子化”

从总量上看，中国人口在2013年达到13.6亿，人口出生率则下降至12.1‰。这一数据背后，隐藏着人口结构深刻变化的现实。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中国正步入“高少子化”阶段。所谓“高少子化”，是指在人口总量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素质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等现象并存的状态。

从质量上看，中国人口素质在不断提升。随着教育投入的加大，人口素质显著提高。然而，人口素质的提升与人口数量的减少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高少子化”趋势，对国家的长期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在保持人口质量的同时，解决人口数量下降带来的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从结构上看，中国人口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同时，人口素质下降、人口性别比失衡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这种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带来了巨大影响。

从趋势上看，中国人口结构将继续向老龄化方向发展。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同时，人口素质下降、人口性别比失衡等问题也将继续存在。这种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带来了巨大影响。

## 高收入国家 解决“少子化”的政策比较

高收入国家在解决“少子化”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有效缓解了出生率下降带来的问题。这些政策包括：提供育儿补贴、延长产假、增加托儿服务、鼓励男性参与育儿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出生率，也促进了性别平等和家庭的和谐。中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国情，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

中国人口“高少子化”趋势明显。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同时，人口素质下降、人口性别比失衡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这种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带来了巨大影响。放开二胎政策，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也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举措。

放开二胎政策，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通过增加人口数量，可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保持人口结构的相对稳定。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放开二胎政策，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通过增加人口数量，可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保持人口结构的相对稳定。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 新常态下全面放开二胎 非常及时

在“新常态”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非常及时的。这一政策不仅符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问题，保持人口结构的相对稳定。同时，也可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通过增加人口数量，可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保持人口结构的相对稳定。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通过增加人口数量，可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保持人口结构的相对稳定。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通过增加人口数量，可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保持人口结构的相对稳定。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 经济增速： 放缓二孩 支撑新常态经济

经济增速放缓，新常态经济正在形成。在这一背景下，放缓二孩政策可以支撑新常态经济。通过调整人口政策，可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也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保持人口结构的相对稳定。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 专家： TPP 最重要影响 是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

随着TPP谈判的深入，其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显现。专家认为，TPP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这一规则将深刻影响中国的贸易环境和经济利益。中国应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加强与TPP成员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TPP谈判的深入，其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显现。专家认为，TPP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这一规则将深刻影响中国的贸易环境和经济利益。中国应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加强与TPP成员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TPP谈判的深入，其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显现。专家认为，TPP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这一规则将深刻影响中国的贸易环境和经济利益。中国应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加强与TPP成员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TPP谈判的深入，其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显现。专家认为，TPP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这一规则将深刻影响中国的贸易环境和经济利益。中国应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加强与TPP成员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TPP谈判的深入，其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显现。专家认为，TPP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这一规则将深刻影响中国的贸易环境和经济利益。中国应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加强与TPP成员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TPP谈判的深入，其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显现。专家认为，TPP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这一规则将深刻影响中国的贸易环境和经济利益。中国应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加强与TPP成员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专家： 建议加快科技 和创业服务业发展

专家建议，应加快科技和创业服务业的发展。这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可以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发展创业服务业，可以为创新创业提供有力的支撑，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 服务实体经济 是互联网金融发展方向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应始终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这是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可以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确保互联网金融的稳健运行。

---

## 声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CISS CASS, 成立于 2010 年 5 月,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研究机构, 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 努力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 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究资源和人才队伍, 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和“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联合发起设立, 受“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直接领导, 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 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 2013 年 11 月开始发布《银华讲座》。其中,《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银华讲座》四项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 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需使用, 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 否则, “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 未经作者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需引用作者观点, 可注明出处。否则, 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工作论文》和《银华讲座》,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mailto: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北京 1104 信箱 ( 邮编：100007 )

电话：( 010 ) 64034232                      传真：( 010 ) 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mailto: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